

美术馆

ART MUSEUM

总第十六期(2009年A辑)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当代摄影与人·社会·历史

美术馆

总第十六期 (2009年A辑) ART MUSEUM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美术馆：当代摄影与人·社会·历史 / 罗一平主编.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608-4280-6

I. 美… II. 罗… III. 摄影艺术—文集 IV. J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38579号

美术馆——当代摄影与人·社会·历史

主 编	罗一平
责任编辑	那泽民
责任校对	徐春莲
整体设计	润泽书坊
出 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发 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地 址	200092 上海四平路1239号
网 址	www.tongjipress.com.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 版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542 000
版 次	2010年4月第5版 2010年4月第5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4280-6
定 价	45.00元

卷首语

本辑推出“当代摄影与人·社会·历史”专题，收入了本年度广东美术馆主办的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学术研讨会的若干篇重要论文。本届摄影双年展的标题是“看真 D. COM”(Sightings: Searching for the Truth)，在这一组合式标题的语义中既含有重要的地方语言的元素，同时又明确地包含有以新媒介传播信息和影像的寓意。策展人小组认为，以“看真 D. COM”作为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希望表达的主要含义是：第一，从“看真 D”这一字义出发，强调源自摄影本体的“看”与“真”，以此重返摄影与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联系层面；第二，地方方言的鲜明元素无疑在主题思想中突出了本土摄影的语境、经验与问题，强调“看”的摄影主体价值观念；第三，在“看”与“真”的前提下，展开以摄影对于社会现实的介入与表述，强调摄影对于社会与人生真问题的持久关注，力图从中呈现丰富的摄影社会学意义；第四，同时也包含着现实与虚拟的双重含义。

本届摄影双年展的上述主题旨在反思在全球化背景下本土摄影发展的基本问题，关注在社会历史语境与当下状况的连结中摄影所承担的作用与功能，尤其是关注和打捞在这种连结中最有价值的摄影个案，同时把图像信息传播看作是实现摄影的社会价值的必要途径。正如陈卫星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所说：“在充满符号记忆的年代，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扑面而来，我们如何感受写真的重负，如何调节感光的视角，如何体会显影的层次，又如何宽容放大的尺度。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并将继续思考的问题。”这里收入的几篇论文正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如关于摄影术进入清宫所引起的政治叙事、民族意识的变化，以及关于摄影与中国现代记忆的紧密联系，都使人对“写真的重负”有深刻的体认；而无论“视角”、“层次”，还是“尺度”，都是作者们在不同的研究课题中反复推敲的框架和思考的维度。总的看来，这些论文都具有把摄影与人—社会—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想特征，自觉地凸现摄影的政治历史与政治伦理的维度；坚持在与人生、社会、历史的真实维系中延伸和拓展摄影的当代语言和个性风格；把人的自由交流与社会记忆看作是摄影传播的基本理由。

在许多研究者的视野中，20 世纪中国历史中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遵循的发展轨迹和内

在逻辑越来越呈现出多重的复杂变奏、历史性的悖谬和吊诡等特征。本期“开放的学科”中的贺照田、张宁二位学者的论文分别探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脉动的原点、轨迹以及后来的历史性分野和 30 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鲁迅的关系及内外斗争，但是其共同之处是对历史语境的感同身受般的悉心辨析和对相关价值理念的探求与认同。目前学界盛行着满足体制性的学术生产之需的时风，如何使史学研究从那种理性化的麻木状态、实用化的学术作秀中解放出来，是值得思考的严重问题。可以说，今天许多史学研究的成果因其对重大事件和历史真相的麻木而显出极为苍白的理性与冷漠；而在“小题大做”、“学术规范”的安全地带中施演“严谨”的学术秀，所有这些都尽显学界时风中弥漫的功利与委琐。当然要做个案，但更要做那些背后潜藏着敏感问题、被刻意遮蔽其历史真相的个案，而不能仅仅以埋首个案研究而自鸣得意，更不应以得一村一庙一页一器之秘而自视甚高。在当前学术景况中，需要重新激发的是思想的激情和伦理的责任，需要的是迎难而上。

自 19 世纪大规模兴起的博览会文化发展到今天，在价值诉求上有民族性、现代性和全球性等不同主旨，各国在自己的形象展示中总是各有侧重。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博览会文化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一直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在世界博览会文化的总体特征的发展过程中，各种时显时隐的政治诉求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滋生。通过科技、文化的展示而获得政治想象的效果，从而争夺大国政治霸权，这是 19 世纪以来各国博览业心照不宣的竞争。同时，在福柯理论的影响下，博览会作为一种文化形象的权力规训的力量也不断被学者所重视。另外，对于隐藏在以倾国之力而塑造的“现代性表征”背后的“现代性焦虑”也正在引起关注。同样重要的是，博览会文化与文化遗产和历史主义的叙事都有着或显或隐的关联，而这种联系与政治诉求的关联则更为内在和重要。本期发表的李军教授《文化遗产与政治》一文着重分析了文化遗产与历史叙事的区分，探讨了几种不同文化遗产类型的政治化特征，拓宽对以“展示”为特征的文化遗产的价值取向的研究视角。

本期关于 20 世纪中国美术的研究文章具有多元化的面貌，既有民国早期的新派绘画的兴起研究，也有过去我们较少关注的台湾现代美术研究，还有特别侧重于基层个案调查的美术宣传工作的历史，以及民间美术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生存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课题的多样性正是迄今为止的现代美术史主流叙事框架所仍然欠缺的，我们希望 20 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视野和叙事框架能够不断朝向多元化和多样性的道路发展。

2009.10.23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Preface

当代文化中的美术馆 Art Museums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文化遗产与政治 李军 002

Cultural Heritage and Politics Li Jun

“广东民间美术生态考察展·粤东篇”策展手记 何小特 016

Curatorial Scripts of Folk Art Exhibition of East Guangdong He Xiaote

开放的学科

A Subject of Open Nature

“当代摄影与人·社会·历史”专题

The Feature of “People Society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清宫摄影的史迹印证与政治叙事 王瑞 032

Photographic Relics of Qing Royal Court and Its Political Narrative Wang Rui

国家仪式、理想生活与人神共体的家国映像：从“慈禧扮观音”看早期中 059

国摄影中的家国叙事与本土摄影“意识”的觉醒 蔡萌

Reflections based on Rites, Idealism The Union of Divinity and Person:

The Enlightenment of Local Photographic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Narrative

represented in “Empress CiXi Disguised herself as Kwan-yin” Cai Meng

摄影在传播时代——从民国期刊看摄影的发展 陈学圣 068

Photography in Communication Era- Photography Development Embodied in

Magazines of early ROC Chen Xuesheng

文化和政治地标布达拉宫——20 世纪 20 - 70 年代汉藏摄影家的 091

藏区摄影 邓启耀

The Potala Palace, a Landmark in Culture and Politics- Photos about Tibet from

1920's to 1970's Deng Qiyao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论张照堂与台湾“现代主义摄影” 郭力昕 099

The Great Sound Seems Soundless, The Great Form has no Shape- Zhang

Zhaotang and Taiwan Modernistic Photography Guo Lixin

摄影的政治叙事：作为证据与记忆的图像——以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 108

双年展为中心 李公明

Political narrative of Photography: Photos as Evidences and Memory—

According to the Third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Biennial

Li Gongming

再现的方位——读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 陈卫星 120

The position of representation——To Read the Third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Biennial (2009) Chen Weixing

- 130 当代摄影的“空间转向” 顾铮
Spatial turn in Modern Photography Gu Zheng
- 143 城市，上海，上海的摄影 姜伟
City Shanghai and Shanghai Photography Jiang Wei
- 155 摄影与神话 林茨
Photography and Myth Lin Ci
- 179 合群开蒙——民国早期“新派画”的引入与传播 杜少虎
Enlightenment of Gregarious Groups- The Importation and Spread of Modern Style Painting in early ROC(1912-1919) Du Shaohu
- 191 同行的莱谟斯与罗谟鲁斯——鲁迅与左翼作家联盟（上） 张宁
Remus and Romulus- Lu Xun and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Part 1) Zhang Ning
- 210 由“光复初期”的美术现象环视二·二八风景 梅丁衍
To Survey the “2.28 Incident” based on Art Phenomena during early days of Taiwan Retrocession Mei Dingyan
- 222 湘西北大跃进时期基层文宣工作的调查——以湖南省汉寿县为例 肖笛
Investigation of Propaganda in Hunan Northwest area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 Hanshou county as a example Xiao Di
- 237 作为“文革”美术单位的广东省幻灯制片厂 李秀棠
Guangdong Slide Factor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vement Li Xiutang
- 259 “科学鉴赏学”中的浪漫主义问题 张坚
Romanticism in Scientific Appreciation Zhang Jian
- 270 当代绘画解读二题 汪民安
Contemporary Painting Interpretation From Two Topics Wang Min'an
- 278 “中国的启蒙是？”“中国的现代是？” 贺照田
What is Chinese Enlightenment? What is Chinese Modernity? He Zhaotian
- 291 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城市文化 迈克·塞维奇 / 艾伦·瓦德 范欣 译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Urban Culture Mike Savage&Alan Warde Translated by Fan Xin
- 300 艺术中的后现代语言 多萝西·欧克乌斯基—拉茨、刘辉 译
Language of Post-Modern in Art Dorothy L. Latz Translated by Liu Hui

策展前沿

The Latest News of Exhibition-curation

- 318 历史与艺术：我们以什么理由来抵抗遗忘？ 鲁明军
History and Art: What's our Reason to Resist Oblivion Lu Mingjun

书林中的多元视角

A Polycentric Review of the Books

- 334 三本书的回忆 傅月庵
Memory of Three Books Fu Yue'an

当代文化中的美术馆

ART MUSEUMS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文化遗产与政治

李 军

一、遗产的态度与历史的态度

本文讨论的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文化遗产的政治”。事实上，“政治”也是文化遗产的本质内容之一。

首先，我们应该对“遗产与历史的关系”作一个区分，考察一下这种区分的含义是什么。例如我们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华夏子孙，是龙的传人，中国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然而，五千年历史的这个说法是否有历史依据呢？最近我们史学界有一个“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的说法。在西方和国内，我们发现对中国早期历史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根据教科书上我们知道，中国第一个王朝是于公元前 21 世纪建立的夏朝。所谓的夏商周三代是从夏朝开始的。从东周开始就流传着关于“九鼎”的传说，说从夏朝大禹的儿子启开始铸有九个铜鼎，这些鼎历代相传，成为王朝合法性的象征。根据传说，这些鼎甚至自己就可以移动——哪个王朝即将得天下了，那么鼎就会不迁自移。这个历史从公元前 21 世纪起，加起来有四千多年，但在我们的观念里，中国的历史可能还要更长一些，所谓的“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一个证明。“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的项目，其意义也在于此。我们最好的学者试图通过天文学、天文考古学等来证明三代历史的存在。但这样一种做法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一些异议，国际上部分学者认为，通过国家的方式来证明一个学术问题，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

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毕业、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艺术史教授的巫鸿先生曾在 1995 年出过一本书《中国古代艺术的纪念性》(*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该书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在我们看来，这一争论同样涉及如何区分两种人类针对过去的主要态度——历史的态度和遗产的态度——在我们看来，二

者之间有重要的差别，但在实际生活中，二者经常不是被混为一谈，就是被当作水火不容的东西而相互取代。

例如，下列民间俗语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概括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自古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中国历史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曾经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古史辨”运动，其基本议题就是“疑古”，就是对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过三皇五帝的怀疑。在“古史辨”运动的主将顾颉刚先生看来，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1]。顾颉刚发现，春秋前的历史记载，最古老的帝王是大禹；到了春秋的时候，《论语》、《孟子》里面，古老的帝王可以上溯到尧和舜；黄帝是战国时期出现的；而到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那里，各种古史传说被编织成一个从皇帝到大禹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大禹都不算五帝了，尧、舜才是最后的两位。我们看到，从这样一个系统来说，既然春秋之前只到大禹，而春秋到尧、舜，而战国时到黄帝，那么，自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越古的帝王，越是晚近才创造出来的。这就是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含义：如同考古学地层显示的那样，在地层上位于最高的地方往往年代是最近的；同理，古史越远，它的年代可能越近——这是知识考古学可以解决的问题。但到了 21 世纪之交时，中国的考古学有了很大的进展，学术界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2]；提倡不要一味“疑古”，而是要在相当程度上“信古”。全国考古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似乎就在于证明夏代的存在。“信古”和“疑古”都对于同一事物而发，但似乎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态度。在“疑古”派看来，既然古代不可证实，则古史即不存在；而在“信古”派看来，既然“疑古”是不可取的，则古史必定存在。在我们看来，这两种态度都有其片面之处，原因在于它们混淆了两种各有其权限范围的合法的态度。

首先，遗产与历史的差别表现在：遗产属于信仰的范畴，而历史属于科学的领域。

文化遗产属于信仰的领域。比如中国人对于我们历史的信仰，如“五千年文明史”、“炎黄子孙”等等，更多地与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和民族认同这样一些问题相关，更多地联系到大众的信仰，它与理智、客观或学术地对待过去有所差别。而历史则属于科学领域，它的目标是真理和真相。炎黄二帝作为中国人的共同祖先是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信仰，虽然在历史上我们

[1]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载《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59-66 页。

[2]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年。

根本无法证明黄帝和炎帝的存在。陕西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最早只能追溯到唐代，把它当作五千年前黄帝的陵墓完全与史无据。但这一事实并不妨碍它在民众信仰的领域真实存在，成为海外华人认祖归宗的目标。换句话说，历史的标准是真相；而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看，标准不是真相，而是愿望：也就是说，它应该是真的。在学术领域里是一回事儿，在信仰的领域是另外一回事儿。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其次，遗产与历史的差别表现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运用的主要是理性，而遗产更多涉及情感。以黄帝陵的例子来说，如果中国人找不到一个黄帝的陵去朝拜来寄托情感的话，那么，中国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根了，这是一种情感的要求。

第三，遗产与历史的区别还表现在：历史作为科学研究的方法，是针对所有人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至于遗产，因为它涉及文化身份的认同，就一定要关涉到特殊的人称代词：如这个遗产是“我们的”或“你们的”。这又是一种区别。

第四点区别：历史是可以讨论的，讨论是它存在的前提；而遗产的领域不太好讨论。如汉族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而蒙古族认为自己是“狼的传人”；二者之间既没有孰上孰下之分，也没有可供讨论的交集。因为那涉及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多地属于信仰、情感的领域。

第五点区别：历史最大的功绩是改变我们对过去的看法。也就是通过学术研究，纠正对过去的看法。而遗产或文化遗产则是指向将来的，它可以帮助人们在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比如说你出国之后，会自然地产生一种关于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会塑造你的身份，甚至直接参与到你的生活里面去，影响你的所言所行。

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的历史学界，长期以来都没有试图在“历史”和“遗产”这两个领域之间去做一个区分，对二者在自己权限范围内的合法性做出具体的规定。这导致学界长期以来总是在二者之间摇摆徘徊，不是以“历史”的名义否定“遗产”（如“疑古”派的文化虚无主义），就是以“遗产”的方式来从事“历史”（例如“信古”派的“奉命史学”）。事实上，只有当学者采取了一种文化遗产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在学术的领域里做遗产的事情的时候，才会引发国外学者对这些做法提出质疑和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

文化遗产的观念是不对的。事实上，正如我们将要指出的，文化遗产涉及一种“集体记忆”，它是人类普遍都具有的一种倾向。

例如，在德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科隆大教堂里面有一批圣物，据说是东方三王留下的遗迹，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三王在明星指引下，千里兼程赶到伯利恒朝拜耶稣。三王朝拜后来成了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绘画母题。三王的遗迹差不多从12世纪开始进入科隆。当时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弗里德里克(Frédéric Barberose)征服了意大利的米兰，有一位科隆主教随他而行并捐助了很多的钱；为了得到回报，主教在米兰进行了一些抢劫，把一些财宝搬回了科隆，据他所说，他在其中发现了三王的遗迹和圣物。这些圣物本身还有一个故事：公元4世纪时君士坦丁大帝把三王遗迹给了一位圣徒，据说这个圣徒用牛车把圣物从君士坦丁运到米兰。后来科隆的主教就说他得到的正是这些圣物，并把它们带回了科隆，放在了大教堂里面。这些圣物成了中世纪很重要的一个崇拜对象。有意思的是，德意志皇帝加冕之后一定要到科隆去朝拜这件圣物。

从历史上来说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完全是科隆主教捏造出来的。捏造故事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为了建立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二是为了科隆这个城市，使之成为中世纪的一个著名的圣地。这两点随后都做到了。现在它仍然是基督徒朝圣的一处重要的胜地。有意思的还在于，后来米兰人也相信了这一点，认为科隆大教堂的三王圣物是德国人从米兰抢走的——虽然它本来是子虚乌有的东西。

然而，这个故事却在历史上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合法性、与科隆这个城市的声誉形成了血乳交融的联系；换句话说，它构造了历史，塑造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和科隆这个城市人的身份，这一切到今天也还是真的。但从历史学角度来说，这个故事完全没有真实性可言^[3]。

以上事例证明，“历史”和“遗产”这两个领域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回到中国的三代和五千年文明史的例子：即使以后历史学或考古学不能够证明夏朝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人的生活和记忆里面，三代作为理想政治的典范是不存在的。“历史”与“遗产”的领域，这完全是两个概念、两个领域。这是很容易混淆的。尤其在中国，中国人一直对历史持有一种文化遗

[3] 参见 David Lowenthal: “La Fabrication D’ un Héritage”, in *Patrimoine et modernité*, Sous la direction de Dominique Poulot, L’Harmattan, 1998, pp. 107 - 108.

产的态度。比如说中国美术史的建构中有一个“南北宗”的模式。董其昌提出“南北宗”是要证明他自己所在的谱系(所谓的“南宗”)、他自己所藏的画乃至所画的画的合法性。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从孔子开始,历史总是需要删节以适应政治和伦理的需要。如诸侯杀死了国君,一定要用“弑”这个字,表示以下犯上,这就是一个“春秋笔法”,是对历史进行的伦理评判。此外,某个人为另一个人所写的墓志铭,总是要做到“为贤者讳”,很多事是不应该讲的。这不是一个学术的问题、真相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信仰、情感和伦理的问题。然而今天,当科学的历史态度被引进之后,我们应该致力于分清这两个领域,不至于使一个领域僭越另一个领域的权限范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混淆不清的地方。

二、什么是政治?

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比中国人更熟悉和理解“政治”这个词。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要学习政治;因为政治在我们的生活里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如笔者那样从“文革”中成长的那一代人,政治还意味着更切身的东西,与生命的生杀予夺紧密相关。在“文革”时什么东西都可能演变为所谓的“政治问题”——如果一个人私下谈论国家大事,说领导人做得不对,就是有“政治野心”。“政治”无所不在,但“政治”又是一种禁忌,是你不能染指的东西;是你没有资格谈论、只能接受的既定事实。粉碎四人帮之后,又产生了一个相反的现象:政治一落千丈,大家都非常讨厌政治,都不愿学习政治,但又不能不应付它。我们可以说,“文革”是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而粉碎四人帮之后又进入了一个“非政治化”的时代。

那么,究竟什么是政治呢?

难道我们真的进入到一个“非政治化”的时代吗?

虽然汉语中组合词“政治”是从日本引进的,但“政”和“治”本身却渊源于古老的汉语形式。孔子《论语》里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4]的说法: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要以德作为原则,就像一个北极星安居其位,自有众多星辰围绕着它旋转。在中国古代宇宙观里,北极星居于宇宙最高的位置,这就像君主和臣民的关系。另外,《老子》里有“治大国,

[4] 孔子:《论语·为政第二》。

若烹小鲜”的话^[5]。无论“为政”还是“治国”，在传统中国思想中意为治理国家的一套原则和方法，似乎仅仅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

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一词，虽然文字来自古代汉语，但意思却来自一个希腊词语“Politikos”（“政治学”）。我们知道，很多的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经研究过“政治学”，留下过这方面的著作。

这个词在词源上与很多词相关，可以引申出好多意思：

首先是“polis”。这个词在一般古希腊历史中通常翻译成“波里斯”，就是“城邦之意。”从“城邦”又可以引申出“Acropolis”即“卫城”：雅典卫城就是一个城邦中的城邦，把城邦最神圣的东西放在里面守护着。

那么“政治”是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就是城邦的生活、城邦里人们共同生活的方式。这里涉及古希腊特有的传统。古希腊人认为只有城邦才有政治，农村就没有政治。它涉及人类群体的共同生活方式，一个公共领域的生活方式。这就是西文中“politik”一词的含义——这接近于中国词“政”的意思。

其次它意味着“polizei”——英文词“police”（警察）即源于此，涉及一个城邦（polis）中居民生活的安全即治安问题——这有点接近于中国词“刑”，即通过暴力的方式保证城邦群体的安全。

还可以引申出一种含义“politesse”，该法文词的意思是“礼貌”和“文质彬彬”，指城邦人之间特有的一种礼仪、交际和游戏活动，是城邦人为人处世的行为方式——相当于中国中的“礼”和“乐”。加起来，西文中的“政治”的外延较中国的“政”和“治”为大，它相当于《礼记》中所说的“礼、乐、刑、政”的总和^[6]。

鉴于以上三个方面都涉及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政治就是在人类群体与群体之间产生的一系列关系及其方式，那么它应遵循什么原则呢？

政治涉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最基本的对立；在内，它涉及公民与奴隶之间的基本对立；在外，涉及敌我之间的基本对立。这样一来，政治涉及人类最基本的身份之间的关系。概括起来，可与人的称谓联系起来，政治即等于确立你、我、他之间的基本区别；从集体意义上来说，相当于确立我们、你们和他们之间的区别。

[5] 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

[6] 《礼记·乐记篇》。关于西文中“政治”引申意义的讨论，参见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世纪出版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第91页。

政治就是进行区分。用的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话说,“划分敌友就是政治的标准”^[7]——政治就是区分敌我、敌友的方式。换句话说,政治就是一种区分你们、我们与他们的方式。人与人之间并不一样。当一个群体要求拥有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时,就一定要区分你、我、他。城邦里的人都是公民,可以叫做“我们”;城邦外的人则分成两类:一类是与我们相安无事或经常有益于我们的人,是朋友;另外一类就是我们的对立面——敌人。敌人往往是“他”或“他们”;朋友则往往是“你”或“你们”。这样,政治就是区分你们、我们、他们;就是区分敌友。在施米特看来,一定要区分敌友,这样才能有助于人们作出决断;而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是一个鼓吹非政治化、鼓吹中立化的时代——但我们不应忘记,其实非政治化也是一种政治,而且还可能是一种虚伪的政治。

既然政治是一种区分我们、你们、他们的问题,那么怎么区分呢?“我们”、“你们”和“他们”又由什么来加以保证呢?

既然“我们”、“你们”和“他们”的区别不能写在脸上,那么,就需要有一些东西来加以保证。例如,“我们”之间有共同的观念、共同的崇拜对象、共同的象征物,这就必然涉及被我们今天当作文化遗产的一些特殊的物质形态(比如国旗、国徽和国宝)和观念形态(民族性、文化身份)。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事情,我简单讨论三点。

首先,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应该有一些共同的有形和无形标准,如相通的语言、共同的祖先、共同的遗产。我们去博物馆时会说:这些是“我们的”遗产。如果在古代的话,这些东西可能是圣物,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可能是礼器,与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

在“我们”与“你们”之间,则是互通有无,礼尚往来。我们发现各个国家都有礼品博物馆,以前可能是统治者之间礼尚往来;现在则是国家跟国家礼尚往来的。老百姓之间就是互送礼物,否则就会感到欠人家的。“礼尚往来”也是收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们”与“他们”也就是敌人之间,则涉及两种方式。“他”是“我”的敌人;“他”有“他”的圣物,“我”有“我”的圣物。对待敌人除了人身攻击之外,还表现在象征和文化的领域:表现在“我”对于“他”的圣物加以破坏和摧毁之上。例如新教对于天主教的“破坏偶像运动”;法国革命派对于旧

[7] 卡尔·施米特著,刘宗坤等译:《政治的概念》,第106页。

王朝的“汪达尔主义”；红卫兵对于封资修的“打砸抢”，都是如此。古代一国攻陷另一国国都时，首先是占领或摧毁对方的宗庙，破坏对方神的神圣性；到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波黑战争也是这样做的：塞族和穆斯林之间相互捣毁宗教圣物和文化遗产，通过破坏对方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来证明自己的优越。

还有一种方式不是破坏，而是把对方的东西作为战利品带回来。法国大革命时，法国利用拿破仑的军事胜利从欧洲各国掠夺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和艺术品。法国的枫丹白露王宫专门设有一个中国博物馆，里面收藏的全是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从北京圆明园劫掠的战利品。当时英国军队抢掠的战利品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们的维多利亚女皇；法国则将战利品献给了拿破仑三世的皇后欧也妮，并被送到枫丹白露宫陈列展出。这些战利品也构成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遗产的归还问题涉及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严格意义上说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三、文化遗产的政治——国族的共同身份问题

既然政治涉及一个群体的共同生活方式，是一种区分敌友的生活方式，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收藏品作为遗产、作为可以传给后代的物品都承担着广义的政治的作用。文化遗产的政治就必然涉及文化遗产的功能和作用，即它们作为“我们”、“你们”和“他们”的身份保证和象征的功能。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政策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一个传统的等级社会里，虽然文化遗产也涉及某个群体的共同身份，但这种群体范围很小，所涉及的领域和范围都不大(限于家族、城邦、地域等)。从18世纪末开始的，现代文化遗产与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开始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逐渐变成维系民族国家国民之共同身份的标志。之所以说它是现代的，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前提：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某个共同体的共同遗产，这种共同遗产是针对该群体或共同体中的所有人的。现代文化遗产的观念是与现代文化体制(诸如博物馆、沙龙、美术学校)几乎同时诞生的，它一方面继承了传统身份被破坏和衰落的事实，另一方面也积极帮助新的国民身份。在对于民族国家共同身份的创造和认同过程中，不乏有种种虚构和歪曲事实的成分存在。

可以近现代希腊民族国家的诞生为例。从 15 世纪开始,土耳其人征服了欧洲的大片土地,希腊成为穆斯林统治的地方。到了 19 世纪末,民族国家的观念随着法国大革命慢慢扩展,在希腊兴起了一种强烈的民族独立的意识。民族主义者一方面开始传播土耳其统治下希腊人如何在文化上受尽欺凌和压迫;另一方面,则努力叙述一些动人的故事,宣传东正教的神父、修道院修士们如何秘密组织希腊语学校,教孩子们学习希腊语言和文化,如何在艰难困苦中使希腊文化薪火相传。然而,这些故事其实是向壁虚构出来的。因为在土耳其人治下,希腊文化和东正教都得到了十分宽容的对待。但是希腊人在创建他们的民族国家时要区分敌我,要树立一个同仇敌忾的靶子,把土耳其人视为破坏希腊文化的罪魁祸首,为了获得一种希腊民族身份甚至不惜歪曲事实。以后,这种意识在希腊民间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对希腊人最终摆脱土耳其人的统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其实这并非事实^[8]。

还有一个例子,同样涉及某个传统民族在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通过虚构遗产所起的政治作用。芬兰有一部史诗叫《卡勒·瓦拉》,很多学者公认这是 19 世纪人们伪造的作品,但是大部分芬兰人都认为它是真的,认为这是他们民族的不容置疑的圣经^[9]。这类事情其实不胜枚举。黄帝陵难道真是黄帝的陵墓吗?成吉思汗陵难道事实上不是一座于 20 世纪 50 年代重建的建筑物吗?然而这些事实并不妨碍它们作为一个神圣的民族文化空间、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仪式空间的真实性。当蒙古族在祭奠成吉思汗时,假如有人当场向他们证明该陵墓并非真实时,他会碰到什么后果?他在挑战一个民族的共同情感!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历史真理的问题,而是一个情感和心灵真实的问题。

笔者曾经翻译过一本书《宗教艺术论》,里面有一个据说是引自中国禅经里面的故事(但我一直没找到过它的出处)。该故事为文化遗产的情感或心灵真实性作了一个极好的注解。故事说,有一位度诚信佛的老太太听说村里有人要去印度朝拜,就请同村人帮她请一颗印度佛牙回来。可是同村人到了印度之后只顾游山玩水,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回到自己家村口时才突然想起来;刚好这时他在路旁看到一条死狗,就把死狗的牙拔了下来交给老太太充数。老太太看到请回的佛牙非常高兴,每天非常虔诚地念

[8] 参见 David Lowenthal: "La Fabrication D' un Héritage", in *Patrimoine et modernité*, Sous la direction de Dominique Poulot, L' Harmattan, 1998, pp. 114.

[9] 同上书, p. 110.